

评“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

徐和雍

(浙江大学 西溪校区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首见于当年《民报》上南史氏(陈去病)的《徐锡麟传》。翌年,陈去病删去“或曰毙于君手”一语,并慎重地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上说随之消隐。此说再度出现是近五十年后凌孔彰的《先师徐锡麟事迹纪略》,但在纪念辛亥革命 60 周年之际,凌对陈伯平之死说法作了根本性的修正,称“陈伯平又在奋勇击敌中首先中弹牺牲。”今有的人未加考辨,把凌孔彰自己已抛弃的说法又搬拾回来,使这个问题平添了新的混乱。

【关键词】安庆起义; 辛亥革命; 徐锡麟; 陈伯平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1999)03-0012-05

Comment on the Version “Chen Bo-ping Was Shot by Xu Xi-lin In Person”

XU Hey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Chen Bo-ping was shot by Xu Xi-lin in person”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Xu Xi-lin’s Biography” by Chen Qir-bing in Minbao, a newspaper, in 1907. The next year, Chen Qir-bing deleted the sentence which says “or Chen Bo-ping was shot by Xu Xi-lin” and signed his name for caution’s sake. This version reappeared 50 years later in the book “Late Master Xu Xi-lin’s Heroic Deeds” by Ling Kong-zheng. But in 1971,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in memory of 1911 Revolution, Ling revised the statement about Chen Bo-ping’s death, saying “Chen Bo-ping laid down his life in the heroic fight against the enemy.” Nowadays, some people picked up the statement cast away by Ling Kong-zheng himself and added some chaos to the fact of Chen Bo-ping’s death.

Key words: Anqing upris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Xu Xi-lin; Chen Bo-ping

1907 年的安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失败了,但一举击毙安徽巡抚恩铭,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志士,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在抗击清军围攻安庆军械所的战斗中,组织和发动这场起义的三位核心人物:陈伯平英勇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后惨遭残酷杀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代史上誉称他们为“浙东三烈士”。但有人也曾提出过“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目前有的作家在撰写有关这段历史的电视剧时,吸纳此说,并加以描绘和发挥,这是值得重视的。陈伯平究竟是在抗击清军的过程中战死的,还是被徐锡麟手毙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关系到徐、陈两先烈的形象及对其领导的安庆起义的评价。本文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共同探讨,辨明真伪,搞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徐锡麟、陈伯平的革命情谊

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必有其深刻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一时的思想冲动。“徐锡

〔收稿日期〕 1999-03-25

〔作者简介〕 徐和雍(1932-),男,浙江永康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麟手毙陈伯平”一事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深入考察徐、陈长期交往和相处的情况是必要的。

徐锡麟,绍兴东浦人,年轻时同众多封建士子一样读书应试,并相继考上秀才、副举。但他有宏大的理想和抱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20世纪初年革命思潮的激荡下,迅速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并成为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领袖人物。为了培养革命干部,有效地组织武装起义,徐锡麟利用自己在新、旧学界的声望,于1905年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师范学堂”,招收有志青年和会党骨干,进行培训。“大通师范学堂”是我国在国内秘密建立起来的第一所革命干部学校。陈伯平是该校的首批学员。陈伯平,绍兴平水人,幼年随家去福建,曾在福建武备学堂肄业,回绍兴后进石门县学堂学习,为反对该校日本教习的凌辱,毅然退学。徐锡麟十分赏识陈伯平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超越师生和年龄的界限,视之为同志和战友,赠以“光复子”别号。陈伯平在徐锡麟言传身教下,迅速转向革命,对徐锡麟怀着崇敬的心情,决心追随其左右,从此成了徐锡麟最得力的助手。

1905年,徐锡麟为了实施“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的革命计划,偕陈伯平等人赴日本学习陆军。他们到了日本,由于清朝驻日使馆的极力阻挠,未能如愿。于是,徐锡麟回国活动,陈伯平改去日本警监学校学习。不久,陈伯平也弃学回国,赴沪协助秋瑾开展革命活动。一次试制炸弹时,不慎引炸,陈伯平被炸重伤,于是回家乡绍兴平水疗养。

徐锡麟回国后,便多方活动,以道员身份分发安徽任用,1906年12月、1907年2月,先后被委派为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取得了一定实权,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于是,徐锡麟邀接替他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共商皖、浙联合举义,并飞书敦促陈伯平、马宗汉速来安庆协助。4、5月间,陈、马先后到达安庆,与徐锡麟会合,共同研究并分头筹措起义有关事宜。徐锡麟加紧发动巡警学堂学生,联络驻扎安庆城郊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陈伯平、马宗汉赴沪与前来的浙江革命党人联系,协调起义的计划部署,并购买枪支弹药、油印机等起义用品。举义前夕,陈伯平撰写了《光复军告示》,徐锡麟在告示上亲自加上五条“杀律”,连夜印就,准备在起义后散发,他们还商定了暴动暗号和作战的具体方案。

1907年7月6日上午,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首届毕业典礼,安徽各级官员纷纷前来观礼。9时左右,毕业典礼开始,徐锡麟向安徽巡抚恩铭大声报告:“回大帅,今天有革命党起事!”发出了暴动暗号,陈伯平随声向恩铭掷去炸弹,可惜没有爆炸,于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拔出手枪向恩铭及其他官员射击。恩铭中弹后由其侍从背负狼狈逃窜,前来观礼的官员如鸟兽散,四处奔逃。起义初战告捷。

接着,由徐锡麟领头,陈伯平殿后,带领巡警学堂起义学生奔往安庆军械所。军械所总办周家煜见状,带了弹药库钥匙,同守卫的兵丁从后门逃跑。军械所不战而克。

上述可见,徐锡麟和陈伯平并非泛泛之交,也不同于一般的师生关系,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在艰难曲折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同患难,共甘苦,充分表现了对革命矢志不移、忠贞不二、团结战斗的精神,这种生死与共的高尚革命情操是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何况当时军械所被清军团团围困,起义军处于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徐锡麟,怎么可能因在所谓“开不开炮”问题上发生争持,就不惜革命友谊,不顾革命大局,竟开枪打死自己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与徐、陈长期来互相敬重、密切配合、团结战斗的事实背道而驰,与徐锡麟一贯的思想风格也格格不入,是极不合情理的。

二、安庆军械所之战实况

要搞清陈伯平之死的事实真相,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军械所的战斗过程中进行考察。

徐锡麟、陈伯平带领起义学生首先进攻军械所,其目的非常明确:夺取枪支弹药武装自己,武装前来应援的各方起义军,然后集中力量,大举进攻,摧毁清王朝在安徽的统治中枢——抚署,进而占领安庆全城。因此,他们冲进军械所,就直奔库房。但库房里堆放的是一些待修的破枪,仅西库房存放着大炮五、六门,炮弹若干箱,而枪支弹药均藏在地下室,地下室入口处覆盖钢板,上加大洋锁,没有钥匙,仓促间无法打开,于是大家把目光转到西库房的大炮。《皖变始末记》一书汇集了当时官府来往函电、刑审情况、社会舆论以及各报的评论和访函等等。内云:

“徐锡麟率领学生入军械所后,拟将所存巨炮一律开放,幸系新式,不知运用,是以束手待捕。”^[1]

作者对起义军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表明他站在官府一方,但其记述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起义军占领了军械所,未能得到预期的枪支弹药的补充,为了坚持战斗,谁都不会反对动用这些大炮。可是,在起义军中包括徐锡麟、陈伯平,以往都没有操演过这种新式大炮,对其结构和性能并不了然,不检查这些大炮能不能施放,就奋力把它拉出库房,架在后厅。在拉炮、架炮的过程中,大家对大炮轰击目标议论纷纷,陈伯平建议先轰毁巡抚衙门和北门城楼,这完全可能。当他们架好大炮准备施放时,才发现缺少炮门,不能施放。于是他们四处寻找,但最终仍没有找到炮门。这一情节时人多有记载,陶成章《浙案纪略》写道:

“乃将巨炮五门运出,装子弹,缺去机铁一块,遍觅无着。”^[2]

“机铁”即炮门。炮门是大炮的重要部件,没有炮门的大炮是不能施放的。起义军虽拥有五、六门大炮,但在军械所整个战斗过程中没有放过一炮,原因就是缺少炮门。既然这些大炮不能施放,所谓“开不开炮”的争执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也就失去了前提和依据。

恩铭(恩铭不久死去)、冯煦等安徽大吏逃回藩、臬各衙署后,随即下令关闭安庆各城门,急调缉捕营、巡防营、江防营的兵勇围攻军械所。安庆军械所是安徽省的军火总库,位于安庆城内邓家坡上,是城中唯一的制高点,建有牢固的库房,四周围以高墙。不久,徐锡麟遥见清军向军械所蜂拥而来,就派陈伯平扼守前门,马宗汉守卫后门。进占军械所的起义军只有二十多人,其中还有一些是被裹胁而来的(参阅《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176页),实际参加战斗的不过十多人,在诺大的军械所抗击四面围攻的清军,只能各自为战,在长达四、五小时的激战中,相互间已无法进行联系,即使居中指挥的徐锡麟,对陈伯平的牺牲也未知其详。他在敌人的刑庭上说:

“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好友。”^[3]

徐锡麟对陈伯平的牺牲仅是耳闻,而非目睹,更谈不上什么“手毙”。至于守卫后门的马宗汉,直到被捕后迫令认尸时,才知道陈伯平已在战斗中牺牲。他在敌人的刑庭上说:

“昨承指认尸首,前门被枪伤死者,确是陈伯平。”^[4]

关于陈伯平的战斗及牺牲情况,潘赞华的《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一文有较具体的记述。写道:

“省方调江防营入城,围攻局所,陈(伯平)据大门在右窗持铳向外射击,杀伤很多人,以众寡不敌,饮弹而亡。”

潘赞华是当时巡警学堂总教习潘晋华之弟。潘晋华支持徐锡麟的革命活动,由于预定起义的日期

以上文字引自原稿,《徐锡麟史料》收录此文后有删改。

提前二天,他外出未归,错过了参加起义的机会,也免受牵连,得以仍在巡警学堂供职,了解清朝官府刑审和调查的情况。潘赞华这段记述显然是其兄提供的,与起义军在军械所抗击清军的分工的众多记载、马宗汉前门认尸的结果吻合,是可信的。陈伯平的尸体在抗击清军第一线的前门,而非后厅,形象地表明陈伯平是在抗击清军的战斗中英勇战死的,绝非为徐锡麟所手毙。

三、“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的来龙去脉

安庆起义震惊清廷,震动全国,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各报刊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纷纷报导并发表评论,其中有人曾提出了“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这种说法,见之于刊登在《民报》第十八号上南史氏的《徐锡麟传》。写道:

军械所“被围,陈伯平死之,或曰毙于君(指徐锡麟——笔者按)手。”^[5]

南史氏是陈去病的笔名,当时他在上海任《国粹学报》编辑,文中没有说明这条信息的来源。翌年,陈去病去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参加了绍兴徐社的活动,对徐锡麟、陈伯平的为人处事和安庆起义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徐锡麟传》被收入《绍兴徐社纪事》时,陈去病删去“或曰毙于君手”一语,并慎重地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尔后,陈去病又撰写了《陈烈士墨峰传》(墨峰系陈伯平的别号)。写道:

丁未春,陈伯平“始复出海上。四月,偕马子畦(子畦是马宗汉的字)至皖,与徐烈士组织革命军成。五月,复至海上,购械还,遂起义,不成,竟死于军械局中。”^[6]

该传关于陈伯平之死虽写得比较含糊,但已不再采用“或曰毙于君手”之类话了,篇首还声称:

“忆君殉义时,余适在沪,忽有自日本投书者,揭之,则赫然君行状焉。”^[7]

说明他的《徐锡麟传》、《陈烈士墨峰传》是依据日本投书提供的资料撰写的,“或曰毙于君手”一语很可能是日本投书中的用语。陈去病开始时全盘接受,后来随着他对安庆起义了解的加深,越来越感到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在修改《徐锡麟传》时将“或曰毙于君手”一语删去,在撰写《陈烈士墨峰传》时就不再采用这个说法了。大家知道,留日华人的思想见解和政治态度很不一致,对安庆起义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赞扬的,有咒骂的。远离安庆、远隔重洋的日本,竟传出前所未闻的独家新闻,令人怀疑是不是一些反对者炮制的,他们借陈去病之手广为传播,混淆视听,企图挑起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打击革命党人的斗志。但这些人毕竟做贼心虚,不敢公开露面,更不敢出来佐证,而陈去病又很快收回这个说法,于是,“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随之消隐。但由于陈去病的《徐锡麟传》刊发在当时影响极大的《民报》上,这个说法的影响不是一时可以彻底消除的。

“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的再度出现是事隔近半个世纪后的50年代,由参加这次起义的当年的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提出的,他说:

“当时陈伯平同几个学生拉出一尊大炮,架在军械所后厅(后厅地势很高,可以看到抚台衙门和北门城楼),随手取了一个炮弹装在炮膛里,对先师说:‘形势已急,我们要用炮先把抚台衙门打掉,使敌人没有发号施令的机关,军心自然涣散,一炮轰击北门城楼,打开城墙缺口,使我们军队可以进出,必要时也使我们突围脱险。’先师说:‘这样做玉石俱焚,与革命宗旨不合,对革命有很大影响,我等纵能成功,百姓受糜烂矣。’坚持不许开炮,陈伯平坚决要打。先师见拗陈不过,就用手枪把陈打死了。”^[8]

由于凌孔彰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他撰写的有关徐锡麟和安庆起义的回忆录,自然备受人们的重视。因此,一些知情人发现文中有失真之处,必然会坦诚的、认真的与他交换意见,这一情况在凌以后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表露。在纪念辛亥革命60周年之际,凌孔彰修改了上述回忆录,题为《徐锡麟

《安庆起义纪实》,刊载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上,对陈伯平之死的说法作了根本性的修正,声称“陈伯平又在奋勇击敌中首先中弹牺牲。”篇首还作了如下说明。

“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时又失去记载,现在仅凭思索回忆,挂漏舛错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采集烈士革命史料的同志以及革命前辈和旧日同学们予以补充修正。”^[9]

我们以为不能把这段话作泛泛的谦词,而是对友人尤其是旧日同学热情帮助的回应。“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是否可信的讨论至此本已告一段落,不想凌孔彰去世后,王华章以整理凌孔彰遗稿名义撰写了《徐锡麟烈士革命事略》一文,刊登在 1981 年出版的《安庆文史资料》第一辑上,又重新提出“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王华章依据凌的哪些遗稿不得知,但就陈伯平之死的叙述,几乎照抄已刊发的凌孔彰《先师徐锡麟事迹纪略》一文,仅把“先师”改成“先烈”以及个别文字的疏通而已。王华章未加考辨,把凌自己已抛弃的说法又摭拾回来,使这个问题又平添了新的混乱。

如今有的作家在撰写有关这段历史的电视剧时,大概读到了王华章整理的文章,对“徐锡麟手毙陈伯平”之说颇感兴趣,认为这个故事情节“有利于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增强电视剧的真实感和可看性。”认定凌孔彰是“唯一亲身参与起义的人员,是唯一的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因而他的回忆录是最为可靠的历史记录。”果真如此吗?难道只有揭露革命队伍内部自相残杀才能“提高电视剧的质量,增强电视剧的真实感和可看性”吗?暂且不说凌孔彰早已修正了自己的说法,当时健在的参加安庆起义的当年巡警学堂学生也不是仅有凌孔彰一人,就笔者所知,70 年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朱蕴山也是。徐锡麟行刑时,朱蕴山、宋豫琳、杨允中、姚向甫等四人被绑赴刑场陪斩,可见朱蕴山和徐锡麟的关系更密切,他在安庆起义中的表现也更突出。朱蕴山没有写过有关安庆起义的回忆录(写有《1911 年春过百花亭追忆徐伯荪师》一诗。见朱蕴山的《过去集》),但 70 年代程鹏撰写徐锡麟剧本时,偕安庆工会干部章润,于 197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曾访问过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朱蕴山,在座的还有朱蕴山的儿子、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的朱世同,留有访谈记录稿。朱蕴山谈到陈伯平时说:“由于孤军作战,陈伯平当场牺牲了,起义失败了。”难道朱的说法可以忽视吗?

笔者以为,反映近代革命运动中真人真事的电视剧是不能背离基本历史事实的,对一些重大问题和关键情节,必须认真核实,务求符合历史真实,不能只考虑“可看性”,任意取舍和塑造。否则是难以达到预期的弘扬爱国革命思想的目的的,反而会起误导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人尹郎.《皖变始末记》(又名《徐锡麟》)[M].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九月新小说社出版.

[2]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C]. 39 - 40.

[3] 《徐锡麟供词》[A]. 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徐锡麟史料》[C];人尹郎.皖变始末记[M].(《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也收有《徐锡麟供》,文字相同,但把“击死者”写成“击者”,显系漏校).

[4] 《马宗汉亲供》[A]. 人尹郎.皖变始末记[M].(《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也收有《马宗汉供》,内云:“大帅命我至军械所认尸,始知陈伯平已经被兵丁打死了。”所述不如前者具体确切).

[5] 南史氏.《徐锡麟传》[N]. 民报第十八号,1907. 12(117).

[6] 陈去病.《陈烈士墨峰传》[J]. 江苏博物馆月刊第五期.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出版.

[7] 同[6].

[8] 凌孔彰.《先师徐锡麟事迹纪略》[J]. 《安徽简报》,1956, 11(18).

[9] 凌孔彰.《徐锡麟安庆起义纪实》[A]. 《辛亥革命回忆录》(四)[C]. 中华书局,1963. 392.

[责任编辑 庄道鹤]